

流动的
中国 LIUDONG DE ZHONGGUO CONGSHU
丛书

一统 路程图记

(明) 黄汴纂
杨正泰 点校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出版社

“流动的中国”丛书
LIUDONG DE ZHONGGUO CONGSHU

总策划 宁致勤 卢海鸣

一 统 路 程 图 记

(明) 黄汴 纂
杨正泰 点校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统路程图记 / (明) 黄汴纂; 杨正泰点校. —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19.8

(流动的中国)

ISBN 978-7-5533-2600-9

I. ①一… II. ①黄… ②杨… III. ①交通运输史—中国—明代 IV. ①F5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24719号

丛 书 名: 流动的中国

书 名: 一统路程图记

作 者: (明) 黄汴

点 校: 杨正泰

出版发行: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 京 出 版 社

社址: 南京市太平门街53号

邮编: 210016

网址: <http://www.njpbs.cn>

电子信箱: njpbs1988@163.com

天猫1店: <https://njpbcmjts.tmall.com/>

天猫2店: <https://nanjingchubanshets.tmall.com/>

联系电话: 025-83283893、83283864 (营销) 025-83112257 (编务)

出 版 人: 项晓宁

出 品 人: 卢海鸣

责任编辑: 刘 娟

装帧设计: 王 俊

责任印制: 杨福彬

制 版: 南京新华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工大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5

字 数: 137千

版 次: 2019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3-2600-9

定 价: 36.00元



天猫1店



天猫2店

总 序

人流、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是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形式、主渠道、主脉搏和主动力。而在明清时期,借助于各地陆路交通、自然河流和人工运河的便利,邮驿、漕运、盐运、各种贸易物资的运输,以及不同人群的往来,对封建王朝的政治统治、国防军事、经济命脉、社会稳定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驿通四方”“邮传万里”,偌大的中国,仿佛在普遍的“流动”中维系着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前行。

回顾历史,在自给自足为主的农业社会里,大多数百姓并不能随意流动,商人往往成为商业流动和社会流动中最活跃的因子。为了便于外出经商活动,明清时期一些走南闯北的商人在注意收集各地程图路引的同时,还通过各种渠道广泛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这些内容构成了日后他们所编纂的商书的主体。从存世的明清商书中,我们能够窥见“流动的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态,获取破解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密钥。

“流动的中国”丛书,选取明清时期四种经典的商书,包括明代佚名编《寰宇通衢》、黄汴纂《一统路程图记》、程春宇辑《士商类要》以及清代吴中孚纂辑《商贾便览》。其中,《寰宇通衢》是记述明初驿站驿路的专书,《一统路程图记》是我

国现存最早的商旅交通指南,《士商类要》是明代商书的代表作,《商贾便览》是清代商书的代表作,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为了更好地发挥丛书的作用,我们邀请致力于明清商书研究三十余年的杨正泰教授,通过整理点校的方式,将原先难得一见、不易阅读的古籍文献,打造成适于广大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读者阅读的普及性读物。

为了尽量保持原书的面貌,除了必要的校注外,我们确定了如下整理原则:书中的通假字、异体字径改;可以确定的错漏字直接补上,无法臆补的用方框表示。为节省篇幅起见,丛书校注中的常用书名皆改用简称,如《明实录·太祖实录》作《太祖实录》,《明实录·太宗实录》作《太宗实录》,其他类推;《寰宇通志》作《寰宇志》;《读史方舆纪要》作《纪要》;《嘉庆重修一统志》作《清统志》;《古今图书集成》作《图书集成》;《一统路程图记》作《路程图记》;《天下路程图引》作《路程图引》;新安原版《士商类要》作《士商类要》;《新刻水陆路程便览》作《路程便览》,等等。

总之,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为读者了解明清时期的山川地理、商业发展、社会经济、民间生活,描绘“流动的中国”意象提供帮助,同时也为专业人员研究明清交通史、商业史提供便利。

导 读

《一统路程图记》又名《新刻水陆路程便览》《图注水陆路程途》，八卷，卷首附图三幅。明隆庆四年（1570）休宁约山（今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新潭镇下约山）黄汴撰。

休宁地处群山之中，地狭人稠，业多为商。黄汴年方弱冠，便随父兄外出经商，“自洪都（今江西省南昌市）至长沙，览洞庭之胜，泛大江，溯淮、扬，薄戾燕都（今北京）”，到过许多地方。后侨居苏州、绍兴等江浙一带，与二京十三省暨边境商贾贸易。经商生涯使他亲身体会到出外经商时“归心迫切”、“前途渺茫”的痛苦，他便在经商之余，留心收集各种程图路引，又利用经商之便，向客商了解各地水陆里程和风土人情，并考其异同，加以校勘，积二十七年之久，撰成此书。

《一统路程图记》辑录路引一四四条，记述水马驿站、行程里距、各地道路起讫分合甚详。山川险夷、物产出处、行程风险、水旱码头、牙侩好坏、门摊课税、名胜古迹，乃至轿夫船户是否可靠，沿途食宿是否整洁等商旅须知，皆有所记。明代地志种类很多，数量也很丰富，但由商人编纂的路程图记却为数不多。迄今所知，这类图记只有《一统路程图记》《商程一览》《水陆路程》《士商类要》《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天下路程图引·天下水陆路程》等数种。它们大部

分散失国外,日本内阁文库和尊经阁文库收集较多,而国内已濒于失传。《一统路程图记》汇集路引较为齐全,记述站程较为详细,佳于同类图记,是现存成书年代最早的一种。该书撰于徽商之手,史料价值很高,颇受中外学者重视。综观全书,虽然有些路引的个别地方与其他史籍记载不同,与考证结果也不吻合,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所记大多数驿站和驿路都很准确,可与拙著《明代驿站考》中的《明代驿路图》一一印证。

《一统路程图记》是参照各种程图路引编纂而成的,许多地方保存着原有程图路引的风貌。例如,原书前四卷细目皆置于卷首,顺序号首尾衔接,自成系统,显然出于同一来源。后四卷细目散见于各卷之中,顺序号以卷为断,各卷不相连贯,内容有相对独立性,与前四卷风格不同。路引用大字书写地名(也有夹用小字者),小字书写里程,但字体又有差别,有的用大字突出府州县,有的用大字突出驿站和小地名,这些都是原始路引留下的痕迹。程图路引的来源较为复杂,少数辑于宋元行纪,多数采于明代程图,有的系作者编撰。黄汴在考订地名时,较为粗疏,一些裁革的州县和废弃的驿站,仍保留于路引之中,有些改道的驿路,或由舟行改为旱站的行程,也照旧抄录,未加改正。《四库全书总目·图注水陆路程途提要》云:“书成于隆庆四年,而犹载广东至安南驿路,盖未弃交趾以前所设旧站,亦乐史《太平寰宇记》载燕云十六州之例也。”此乃又一见解,录此供读者参详。

《一统路程图记》是一部记述路引和程图为主的专书,其主要内容和史料价值体现在三方面:

1. 路程图(又称程图):刻于《一统路程图记》卷首的《北

京至十三省各边路图》和《南京至十三省各边路图》是两幅珍贵的明代程图。这两副地图大小相等,内框长 25.8 厘米,宽 18.5 厘米,绘有二京十三省等重要地名及主要交通路线。二京十三省地名外加方框,区别于一般府州县。地名之间用虚线连接,代表交通干线,表示这些交通路线的分布范围和覆盖地区。《北京至十三省各边路图》标绘地名 76 处,绘制以北京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的驿路图。《南京至十三省各边路图》标绘地名 74 处,绘制以南京为起点,通往全国各地的驿路图。

这两幅地图均未注明标准年代。编绘者称:“北京至富峪(今河北平泉县北)、会川(今平泉县西)、大宁(今内蒙古正兰旗东北闪电河)三卫”、“北京至开平卫(今内蒙古宁城西)”为“旧址路”,显然是指宣德时废弃的明初驿路,黄汴未将其绘入图中,说明这两幅地图绘制的交通路线,应该是明成化年间或更迟一些的交通路线。这两幅地图中,标有宁羌州(今陕西宁强县)和兰州二地,宁羌州置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兰州置于明成化十二年(1476),据此推断,这两幅程图绘制的时间当在明嘉靖、隆庆年间,而不会更早。

这两幅地图均为示意图。单就程图本身而论,并无特别之处。如参证路引,进行比较研究,便会发现作者独到的构思以及程图的作用。程图和路引的关系,犹如总纲和细目的关系。程图所示,皆交通干线,表示大范围的地理位置和行程方向。路引详载站名、里距、道路的起讫分合,附录山川险夷、著名出产、治安好坏、牙行优劣等内容。士商行旅根据程图所示方向,检索路引目录,查找相关地名,便知行程里距和沿途情况。路引记载站程的里距,从五里到一百八十里不等,

大多数在六七里至八十里之间。一般来说,土著居民对方圆百里之内的地名和道路比较熟悉,士商行旅只需使用程图和路引,再辅以询问,便能顺利地到达目的地。程图和路引在指导旅行经商方面的功用,完全可与现代大比例尺的地图相媲美。其设想之周到,构思之巧妙,可谓匠心独运。

流传至今的明代地图很多,有世界全图、疆域政区图、军事防务图、河工图、漕运图、航海图、城镇图等等,但类似于《一统路程图记》卷首的程图却绝无仅有。这类程图出现很早,决非仅此一种,但这两幅程图却是绘制年代较早而至今犹存的程图。作为程图的实物资料,其文物价值是很高的。

2. 河套图:《河套图》是一幅大有来历和很有水平的地图。该图内框长 25.8 厘米,宽 18.5 厘米。以黄河、长江二流域为主区,东起开元、辽阳,西至黄河源星宿海,北逾河套,南及岭南。绘有名山大川、二京十三布政司及重要地名三十余处。图内,黄河、长江及主要支流用双线表示;湖泊用封闭曲线,内加水纹表示;主要山脉用正面投影形象图例表示;海域用波纹表示;二京用方框表示;其他地名用文字表示。图幅左上方注云:“是图出东坡地理指掌,吉安罗君得元人朱思本画方之法,梓成巨本不多,有人所罕见者。今据其图并录其说,使人得而见之。”

注文所云“吉安罗君”,指明代著名地图学家罗洪先。罗洪先(1504—1564),字达夫,号金庵,江西吉安府吉水县人。他以元人朱思本的《舆地图》为基础,又搜集资料,增加内容,将《舆地图》改绘成著名的《广舆图》。《广舆图》的主要贡献是:一、将朱思本“长广七尺”的大图,按照分幅的办法,改制成地图集;二、除改绘朱思本《舆地图》外,又增加数十幅

朱思本原图没有的图幅；三、最早在地图上使用图例符号。经过罗洪先的努力和改造，朱思本的绘图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广舆图》成为明代地图学上继往开来的代表作，影响我国地图学数百年之久。黄汴云：“吉安罗君得元人朱思本画方之法，梓成巨本不多，有人所罕见者。”所指即此。

《河套图》是根据罗洪先的编绘原则，利用《广舆图》的先进成果而绘成的简图。它的图面内容、文字注记和绘制手法，与《广舆图》卷一《舆地总图》、《山东舆图》、卷二《河套图》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罗洪先编绘《舆地总图》（上海图书馆藏《广舆图》，明万历七年刻本）的原则是：“每方百里，只载府，不书州县。山止五岳，余别以水，不复概书。”该图内框长 27.5 厘米，宽 39 厘米，图幅不大。在应用现代印制技术前，能够容纳的行政区划和地理要素不多，一切必须择要入图，否则图幅难以安排，所以在行政区划方面，“只载府，不书州县”。绘出的名山，只有泰山、华山、嵩山、恒山、衡山，水系只有黄河和大江，大湖只有太湖、鄱阳、洞庭、马湖以及西北的兀达脑儿，另有四处湖泊未注名称，其余内容一概省略。黄汴编绘《河套图》时，由于图幅不及《舆地总图》一半，遴选入图的内容更为有限，所以《河套图》只标二京十三布政司，而不书府州；入图的山，除增加与江源有关的岷山外，只收五岳；水系也只绘黄河和大江；绘出的大湖，省去西北边陲的湖泊，其余和《舆地总图》一样。此外，海岸线轮廓、水道走势十分相像；黄河、长江无论是源头和河道流向，还是支流和入海口的绘法，都与《舆地总图》一般无二。可见黄汴采纳了罗洪先精选内容和择要入图的编绘原则。

《河套图》全文引用《广舆图》卷二《黄河图》的旁注(全文略,详见《一统路程图记》),通篇总共 318 字。注文虽未明言引自何处,但对照《广舆图》,除“过外境”的“外”被改为“虏”字外,其余 317 字一字不差。这一不同,究竟是黄汴所改,还是刊刻错误,不得而知,但从《一统路程图记》其他的行文分析,黄汴曾数次用“虏”字,故笔者以为前者可能性较大。以上种种情况表明,黄汴所云“据其图并录其说”,诚非虚妄也。

《河套图》并不是简单仿照《广舆图》的复制品,而是充分吸收和利用《广舆图》多幅地图研究成果,重新创作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三点:

①参考《广舆图》最新版本对黄河源的画法,较早在地图上普及元代考察河源的成就和明代绘图学的成就。

黄河源地处高寒地区,人迹罕至,河源究竟在何处,长期以来,未有定论。元至元十七年(1280)都实考察黄河源,是我国历史上封建国家第一次有组织地对黄河源进行的专门考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后来,元翰林学士潘昂霄根据都实之弟阔阔出的记述,写成考察河源的专著《河源志》,此外,临川朱思本从八里思家得到帝师所藏的梵字图书,其中也有一份考察河源的记录,与“昂霄所志,互有详略”。这两个材料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记述考察黄河流的专门著作,原著久已不存,惟《元史·地理志》在《河源附录》一文中有所辑录,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二保存有《河源图》。《河源志》根据野外考察获得的资料,记述了黄河上游的主要支流和水文特征,以事实否定了汉代以来盛行的“重源伏流”说,在指出星宿海是河源的同时,还注意到“东北流百余里”的火墩脑儿,这一发现不仅比唐代大有进步,与现代调查结果也

吻合,充分反映了元代考察河源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元代考察河源的报告,当时没有公布,鲜有人知。《元史》修于明初,洪武刻本是祖本,藏于内府,束之高阁。嘉靖初,编刊二十一史,方在社会上流传。朱思本所绘《舆地图》原本面积太大,不便翻刻,故流传不多。摹绘本及刻石久已不存,根据朱思本改绘的《广舆图》,第一次刊印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第二次刊印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第三次刊印在嘉靖四十年(1561),其间还有手抄本和其他刻本。值得注意的是,《广舆图》是在嘉靖四十年(1561),刻本中始将黄河源改成葫芦形的,《河套图》的黄河源也呈葫芦形,其刊印时间是隆庆四年(1570),两者相差不过10年时间。这在信息传播管道不畅,传播速度有限的古代,如此迅速地转载元代考察河源的发现,并出版有关地图,对大多数民众来说,不能不算是很新的信息和研究成果。商书编绘和出版这类地图,比《广舆图》本身影响的面更大,因此在传播元代考察河源方面的贡献,比《广舆图》大得多,《河套图》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②标绘漕运备道——胶莱新河,表明作者对国计民生的关注。

元代以大都为京城,远离经济发达的南方,大部分漕粮和军饷皆需南方供给。为解决漕运问题,元政府开凿了北起大都,南至杭州的大运河。由于黄河含沙量太大,受其干扰,运河也经常淤浅,再加上工程技术方面的原因,这条大运河很快便失去漕运的功能,漕粮仍由海道运往京师。明代建都北京,南粮北运的格局未有改观,永乐间浚疏大运河成,改海运为河运,但黄河仍经常影响运河,使漕运发生困难,故有明

一代虽以河运为主,但海运始终不弃。海运路途远,风浪大,粮船经常沉没,粮食不能准时按量运到大都,运粮军民也视海运为畏途,经常逃亡。海运绕道最远和风险最大的地区,便是粮船经过的山东半岛。为减少粮船沉溺事故,寻找运河备道,元明政府数次议开胶莱河。元代胶莱河地区,旧有二水,源出高密县,分南北流,南流者从胶州麻湾口入海,名胶河;北流者从掖县海仓口入海,名莱河。二河中间,相距三百余里,本不通航。元至元十七年(1280),莱人姚演献计开新河,凿地三百余里,沟通莱河和胶河,谓之胶莱新河。胶莱新河开通后,江南海运自太仓出口,抵达胶州,经胶莱新河,出海仓口,浮海抵直沽,“可避东北海险数千里,较漕河为近”。但胶莱新河地质情况复杂,施工难度较大,耗费银两惊人,开与不开,争论非常激烈。明嘉靖中,曾因元人故道,“凿马壕以趋麻湾,新河出海仓”,“由是江淮之舟达于胶莱”。当时,朝野上下十分关注胶莱新河,这个问题可说是社会议论的热点。《河套图》未画京杭大运河,但却画上胶莱新河,表现出黄汴对胶莱新河的重视,以及他对社会热点问题敏锐的洞察力。《广舆图》卷一《舆地总图》绘有胶河和莱河,但无注记。《山东舆图》绘有胶水,文字注记曾提及胶莱河,但地图上未标明名称。《河套图》不仅明确绘出胶莱河,还标注了名称,这是黄汴《河套图》超过《广舆图》的地方之一。

③《河套图》标注的海陆岸线、河道走向和地名位置,更接近现代测绘地图,较其他商书地图准确。《河套图》未用计里画方法绘图,但其所绘的海陆岸线、河道走向和地名位置的准确性,都比同时期商书地图高出一筹。例如天启六年(1626)出版的《士商类要》卷首《舆地总图》(以下简称《舆

地总图》)就不如《河套图》。在海陆岸线方面,《輿地总图》未标出向东突出的山东半岛;而《河套图》绘出了明显的半岛地形。在黄河流向方面,特别是源头和上游的走势,《輿地总图》与今实测地图相比,准确性较差,而《河套图》则与现代实测地图相近。在标注地名方面,《輿地总图》的取点定位存在不少明显错误,如将嘉峪关标注在河套内,贺兰山标注在河套东,而《河套图》标注的嘉峪关在河套以北,贺兰山在河套以西,与今实测地图一致,其他地名如甘州、肃州、贵德等地的方位也较为准确。《輿地总图》水道表示方法不一致,黄河在双线内加波形水纹,大江及其他水道在双线内则未加波形水纹,而《河套图》则绘法统一,不存在这类问题。《一统路程图记》成书早于《士商类要》,但其编绘或参照的地图却比《輿地总图》科学。作为一名商人,在搜集和编纂商书时,能够及时掌握和正确运用地图学的最新成果和制作方法,编绘出高品质的示意图,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 路引

路引类似于道路指南,是古代士商旅行的文字说明书。基本内容是记载行程的站名、所属州县、站距里程、分路去向。站名下偶有夹注,路引后或有附注。夹注和附注的内容,因地制宜,语言文字简洁扼要。站名和主要地名用大字表示,其余内容用小字刊刻,成双行排列。路引长短不一,视路程远近而不同,短的寥寥数语,长的多达四五千字。

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熟悉道路,了解各地的商情和民情,否则困难重重,寸步难行。古代没有大比例尺的旅行图和交通指南,因而具有丰富信息的路引便成为商贾争相搜集的重要资料和大多数商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国内道路有水陆二途、主干线、干线、支线、间道、便道、小路之分。商书辑录的路引,主要是主干线和干线、支线、间道、便道、小路不胜枚举,多略而未收。

道路的主干线是驿路。驿有馆舍、驿官,设有驿卒、马驴、站夫、红船、快船、铺程及一应用具,组成一个庞大的道路网络,并通过这个网络传达政令、报告军情、递送使客和转运物资。驿路经过修缮,较为近捷。

二京至十三布政司、各布政司至所属府,都通驿路。《一统路程图记》载有二京之间、二京至十三布政司、各布政司至所属府的驿路路引。

干线是仅次于驿路的重要道路。它是连接府州和重要卫所之间、军事要地之间、主要商埠之间、市场和产地之间、水陆码头和车船换乘地点之间的要道。《一统路程图记》也辑录一百余条,主干线加上干线基本反映了明代主要水陆道路的分布状况。有的商书辑录驿路路引,也收支路路引,《一统路程图记》前三卷为驿路路引,后五卷为支路路引;有的商书不收驿路路引,专收干线和支路路引,如《士商类要》辑录的一百条路引即是。就反映明朝中后期交通道路的总体布局而言,前一种商书面向全国,主次清楚,明显优于后者,《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在众多存目中选收《图注水陆路程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选收《一统路程图记》而未收其他商书,这可能是重要原因。

路引的旁注和夹注是路引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记载的土特出产、山川险夷、历史古迹、民族风情、物价贵贱、治安情况等,内容十分丰富,几乎涉及到士商行旅关心的方方面面。

旁注和夹注重视记录各地风景名胜,对泰山、嵩山、衡

山、华山、普陀山、峨眉山、牛首山、五台山、雁荡山、三峡、浙江潮等皆有所记，称这些路引为我国最早的旅游交通指南也不为过。

有鉴于此，吴岫在《后序》中评价《一统路程图记》说：“是书也，士大夫得之，可为四牲览劳之资；商贾得之，可知风俗利害。入境知禁，涉方审直，万里在一目中，大为天下利益，实世有用之书，与古辘轳使者方言等。”

中日学术交流的倡导者之一、日本著名明史专家山根幸夫教授在《东洋学报》第七十五卷第一、二号（1993年10月）上发表论文，专门介绍和评价我校注的《客商一览醒迷·天下路程图引·天下水陆路程》（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九月出版），并立即为我寄来了这本杂志。他在这篇论文中，高度评价了笔者的学术贡献，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使我获益非浅。他认为，《一统路程图记》和《天下水陆路程》本为一书，《一统路程图记》是原刻本，而《天下水陆路程》是翻刻本。他还指出，日本内阁文库的《一统路程图记》，卷首有黄汴序、《北京至十三省各边路图》、《南京至十三省各边路图》，卷末有吴岫后序。他在这篇论文中，特意摘引了黄汴序和吴岫后序的全文，并希望出版《天下水陆路程》时，能收进上述二篇序文。山根先生严谨的学风和热忱的态度，令人感佩不已。

需要说明的是，1994年出版的《明代驿站考》及附录整理在前而出版在后，而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客商一览醒迷·天下路程图引·天下水陆路程》却整理在后而出版在前。关于《一统路程图记》各种版本的情况，我在初版《前言》中已有说明。遗憾的是《明代驿站考》及其附录出书太晚，山根先

生无从得知我已作过的研究。本以为《天下水陆路程》是《一统路程图记》的翻刻本,且应出版在后,没有必要再去重复已经做过的研究,而未曾想到它会引起国外学者如此的关注。无论如何,山根先生的研究和建议对我仍有很大的帮助。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吴岫校钞本卷首与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一样,惟卷末没有吴岫后序。今天,我能用山根先生提供的资料,补上吴岫后序,实在非常高兴。各位读者能够读到佚失已久的吴岫后序,也会感谢山根先生的。

《一统路程图记》的钞本和刻本,国内仅存三种^①,吴岫校钞本藏复旦大学图书馆,胡文焕校刻本藏上海图书馆;《新刻水陆路程便览》(残本)胡文焕校刻本藏北京图书馆。现在出版的点校本,是用吴岫校钞本为底本,胡文焕校刻本为参校本整理而成的。

关于本书的整理工作,说明如下:

一、前四卷目录原列于卷首,后四卷目录原散见于各卷,今统一排列于全书之前;

二、原书卷首目录与卷内目录不一致者,参互订正后,已改同一律;

三、各卷细目顺序号杂乱不一,因涉及内容,不便改动,仍然照旧;

四、卷四原细目前的说明文字,易与前卷细目的内容混

^①1993年开始编纂、1997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地理类》(第166册)收有黄汴撰《一统路程图记》,系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的影印本。笔者点校时,尚无缘见到此影印本,故云:“《一统路程图记》的钞本和刻本,国内仅存三种。”